

增城方言志

王李英 编著

增城方言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增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组织编写
广东增城市增城宾馆

增城方言志

第二分册

王李英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增城市农村客家方言主要居民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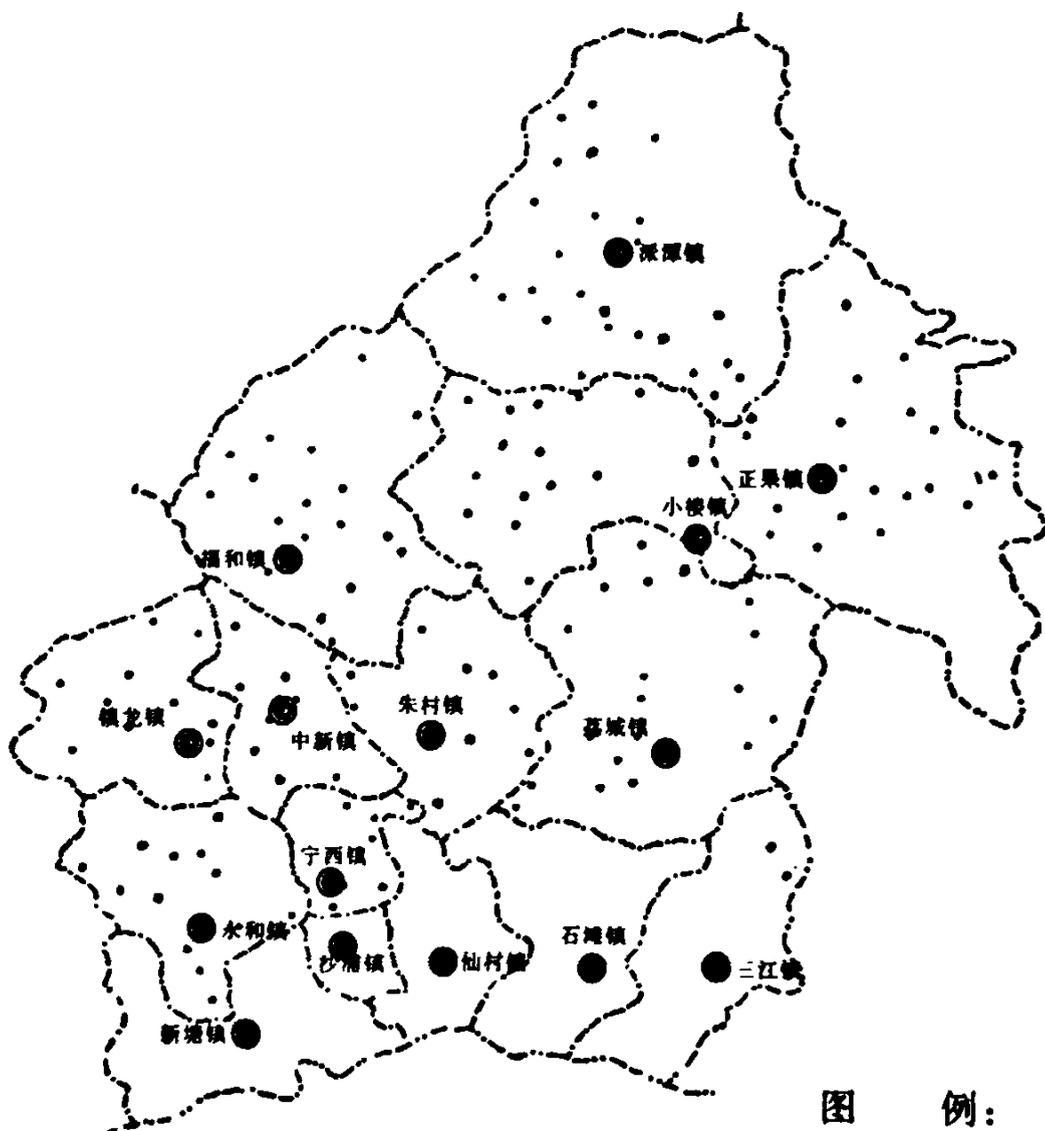


图 例：

镇：●

客家方言居民点：●

(该图绘自《94 增城》)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客家人迁徙入增的历史	(1)
第二节 客方言居民点的分布	(8)
第三节 增城客家话的内部差异	(41)
一、语音的差异	(41)
(一) 程乡话与长宁话的差异 ...	(41)
(二) 程乡话的内部差异	(44)
(三) 长宁话的内部差异	(45)
二、语法的差异	(47)
三、词汇的差异	(49)
第四节 调查点的选取及音标说明	(55)
第二章 程乡话	(59)
第一节 语音	(59)
一、声韵调	(59)
(一) 声母	(59)
(二) 韵母	(61)
(三) 声调	(63)
二、声韵调配合关系	(63)
(一) 声韵配合关系表	(63)

(二) 声韵调配合关系表	(64)
三、同音字与普通话读音对照字表	(79)
四、文白异读	(146)
五、音变	(149)
(一) 同化	(150)
(二) 异化	(150)
(三) 加音	(150)
(四) 合音兼减音	(150)
(五) 减音	(150)
六、语音特点	(151)
(一) 声母的特点	(151)
(二) 韵母的特点	(152)
(三) 声调的特点	(155)
第二节 程乡话与普通话语音的比较	(156)
一、声母的比较	(156)
二、韵母的比较	(162)
三、声调的比较	(178)
第三节 词汇	(184)
一、词汇特点	(184)
二、分类词表	(198)
第四节 语法	(254)
一、语法特点	(254)
(一) 构词方式	(254)

(二) 前缀后缀·····	(254)
(三) 重叠方式·····	(261)
(四) 人称代词的数与格·····	(268)
(五) 指示代词的近指、较远指和远指 ·····	(269)
(六) 疑问代词与指示代词的词形变化 ·····	(270)
(七) 语序·····	(270)
(八) 时态、动态的表示·····	(272)
(九) 比较句·····	(272)
(十) 处置式的表示·····	(273)
(十一) 被动句·····	(273)
(十二) 双宾语句·····	(274)
(十三) 反复问句·····	(274)
(十四) 动宾补句·····	(276)
二、语法例句·····	(276)
第五节 标音举例·····	(289)
一、谚语·····	(289)
(一) 农业气象·····	(289)
(二) 日常生活·····	(292)
二、童谣民谣·····	(297)
三、谜语·····	(302)
四、歇后语·····	(306)
五、山歌·····	(307)

六、民间故事	(310)
第三章 长宁话	(313)
第一节 语音	(313)
一、声韵调	(313)
(一) 声母.....	(313)
(二) 韵母.....	(314)
(三) 声调.....	(316)
二、声韵配合关系表	(316)
三、声韵调配合关系表	(318)
四、长宁话同音字与普通话读音对照字表	(335)
五、语音特点	(397)
第二节 长宁话与普通话语音比较	(400)
一、声母的比较	(400)
二、韵母的比较	(404)
三、声调的比较	(418)
第三节 语法例句	(420)
后记	(430)

序

詹伯慧

近十多年来，在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域中，《方言志》的编纂堪称是异军突起，气势非凡。在某些省份，如山西、云南、山东等等，《方言志》已是“批量上市”，出现在书架上，令人有琳琅满目之感。《方言志》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显示出汉语方言工作的兴旺发达，大有作为。历史上编修的许多地方志书，也常常可见《方言》的篇章，但大都只是列举若干地方上常见的俚俗土谈，摆出零零星星的几个方言词语罢了。现代语言学中“方言”的内涵，要比古代学者所理解的宽广得多，丰富得多。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这十来年，当一股编修地方志的春风从上而下地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刮起来时，有幸参加到“修志”行列中来的语言工作者，才想起有必要按照语言的实际来揭示方言面貌，阐明方言特点，为此就得认真对待各地地方志中方言志部分的编纂工作。这些年来，我们的方言学界，自然也就为此而忙碌起来，许多人都“承包”起若干地方方言志的编撰工作来。

方言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结构。调查研究方言，自然要兼顾组成方言整体的各种语言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尽管每种方言都离不开语音、词汇、语法，但如何描写、分析一种方言

的语音、词汇、语法，如何准确地揭示一种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何突出方言中的某些特殊之处，充分显示该方言的“个性”，如何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方言和共同语，方言和方言的异同进行阐述，如此等等，决非那些未经严格专业训练的人士所能胜任。而编纂出版各地方言调查专著，以及作为地方志中《专志》的《方言志》，其质量如何，当然首先也要视乎执笔者的水平如何了。能不能既遵循语言学、方言学的理论方法，而又顾及地方志书的总体要求，无疑是衡量《方言志》质量的一把准尺。众所周知，60年代出版的《昌黎方言志》，被认为是现代汉语方言志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一部佳作。此书正是在当代方言学权威丁声树先生和李荣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组织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对昌黎方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后编纂出来的，它既是一个地点详尽的方言记录，也是一项方言研究的优秀成果。80年代以来各地出版的许多《方言志》，尽管详略不一，体例不一，但编纂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视乎方言的实际，尽可能做到比较准确地反映方言的实况，揭示方言的性质和特点，并列举一定数量能代表该方言实况的语料。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多是从事语言研究的专业人员，受过较严格的方言调查训练，写出来的《方言志》大都能够达到准确反映方言面貌，勾画出方言特点来的目的。

在全国范围内，尽管《方言志》的编纂工作正在大踏步前进，但各地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由于当地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在语言工作者的努力下，对《方言志》抓紧不放，《方言志》的编纂、出版工作也就能够顺利开展；反之，有的地方由于主管部门和领导重视不够，甚至认为《方言

志》可有可无，《方言志》的编纂、出版也就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了。拿我们广东来说，这些年来经济不断发展，地方志的编纂也全面开展，已出版了不少县（市）的地方志，可是，作为“专志”的《方言志》，迄今已编就刊行的仍寥寥无几，跟山西、云南等省简直不能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增城县（现已改为县级市）的党政领导独具卓识，早在80年代就下定决心，要组织力量编好反映增城语言面貌的《方言志》。十多年来，在抓紧县志纂修的同时，特邀增城籍语言学者、华南师范大学的何伟棠老师和王李英老师着力承担增城方言志的策划和编写工作。鉴于增城兼具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两大方言，县方志办经过研究协商，又决定不计成本，分两个分册来出版《增城方言志》。何伟棠老师先走一步，早在1993年已出版了详细记录、描写增城粤语的第一分册，接下来便由王李英老师来筹划编纂这部记录、描写增城客家话的第二分册了。这两部著作约共40万字，毫无疑问，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的面貌通过这两部方言志，是可以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方言志所反映出来的一县双语的现象，在语言研究中，从来都是相当引人瞩目的，也是语言学者很乐意花大力气来加以探讨的。就以广东来说，粤东有兼具客家话和潮汕话（闽方言系统）的地方，如我的家乡饶平县，还有丰顺县、揭西县等，都是闽、客方言混杂的地方；粤北韶关地区向来也是粤、客方言杂处之地，粤中、粤西同样都有许多地方又粤又客、粤客并存。而珠江口上的东莞、宝安等地，更是典型的粤、客两大方言交错地带。尤有甚者，中山一市竟是粤、闽、客三大方言具备，各有地盘，和睦相处。对于这些双语双方言并行不悖的地区，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自然是一方面分别对不同方言进

行如实的记录，一方面也留意到不同方言间如何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以至于如何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增城粤语也好，增城客话也好，它们总是跟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存在着一定差距的。通过对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的调查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粤方言和客方言的内部差异，从而达到更全面认识粤、客两大方言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增城方言志》粤语分册和客语分册的陆续出版，对于推动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记得好几年前周日健教授给我看他编纂的《新丰方言志》，新丰方言也属客家方言的范畴，但县内除了颇具特色的新丰客家话外，又有一种当时系属未定的“水源话”，这种话由于明显存在着一些跟粤语相同之处（如客家话地区大都没有的撮口呼 y、y- 韵），有的人认为它是粤方言的一种。经过周日健教授认真细致的分析，最后确定水源话是一种受粤方言影响的客家话，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水源话归属问题。我是十分赞赏这种面对语言现实，弄清语言系属的治学态度的。如果不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基点上来认真考虑某些双语或多语地区的语言归属问题，恐怕就不大容易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来。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既然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又都有明确的分界，它们的“身份”自然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何伟棠老师和王李英老师对增城各地的粤语和客话所作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如实地揭示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各自存在的方言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有了这些翔实可靠的方言记录，人们对增城方言的整体面貌，也就可以得到明晰的印象，不会存在什么疑问了。就拿增城客家话来说，王李英老师抱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长期以来致力于搜集县内两种客家话——长宁话和程乡话的资

料，一旦到了需要编写《方言志》时，这许多长年积累的语料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我们只要看看本书《导言》中的各节，便可以体察到作者调查工作的深入细致。在《客家方言居民点的分布》一节中，作者对全县 21 万多客家人（占全县人口 39.2%）的居民点逐一加以列出，其中纯客家自然村 91 个，粤客杂居的自然村 73 个，两者共有 164 个。而在《增城客家话的内部差异》一节中，作者先就增城两种客家话——程乡话和长宁话之间在声母、韵母、声调诸方面的差别分别逐项列出，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确属与众不同的特色，如古微母字今程乡客家话中不少保留双唇鼻音 m-，这跟当今粤语相同，显然是粤语影响客语的结果，又如程乡话无撮口韵，无介音 u，而长宁话恰好相反，有介音 u，有撮口韵。这似乎反映出两种客家话在和县内粤语接触之下，都已处在不同程度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之中。在弄清楚程乡话和长宁话这两种增城客话的内部差异之后，接下来作者又进一步就程乡客话和长宁客话的内部差异逐一加以列举。这样抽丝剥茧式地揭示方言内部存在的差异，增城客家话的语音个性，也就可以一览无遗了。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增城方言志》（客家话）在词汇语法的叙述方面比之一般方言志来显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在语法方面，作者对程乡客话的语法特点，从词法到句法列出了 14 项之多。这和我们当前方言研究提倡要扭转只顾语音的“单打一”偏向，把注意力多多投向揭示词汇、语法特点方面中来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毫无疑问，由熟谙本地方言的增城学者王李英老师精心编纂的这本《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增城客家方言乃至认识整个客家方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

《增城方言志》两个分册的先后出版，我们对增城全市城乡各地的语言应用情况也将会有更多的了解。《增城方言志》堪称为增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精品，也是广东语言学界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值此书稿付排之际，拉拉杂杂写上我的一些感想，并向本书的作者表示我的祝贺和敬佩之意。我们殷切期待着广东的“方言志”工作能够不断传来喜讯，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1997.3.20 于暨大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客家人迁徙入增的历史

根据新编《增城县志·人口卷》所附 79 姓氏 364 个村庄开居简况所载，较早期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家族，于南汉大有七年（934）从广东河源迁至福和古屋。在明代迁徙入增城的有邓姓居民，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从福建汀洲迁至派潭围园；另一邓姓居民于明正德二年（1507）从派潭草洞迁往小楼青径村。郑姓居民于明正德十年从广西迁往派潭镇双头南兴村。潘姓居民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从广东新丰迁至派潭高滩上塘村和荔城镇棠厦村。夏姓居民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迁至荔城镇棠厦鸡心岭（来源不详）。郑姓居民于嘉靖四十四年从博罗大罗陂迁至正果西湖滩。罗姓居民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从新丰迁至派潭罗黄洞。朱姓居民于明万历二十七年从新丰沙田迁至派潭牛轭曲。郑姓居民于万历四十三年迁至派潭犁头咀（来源不详）。另一郑姓居民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从嘉应州迁至小楼乌石田。可见，明代以前已有客家人迁至增城居住，明代迁增开居者渐众。

现存史籍中，最早记载客家人入增情况的是编于清康熙二

十五年（1686）的《增城县志》。其卷一《輿地》记载了一些村落为英德人或英宁（英德、长宁）人所居，这些村落便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现摘录如下：

庆福都 在县西附城五里。编户四图，统村二十有六：径下，今英德人居；陂下，今英德人居；百花林，今英德人居。

金牛都 在增江之东，自陆村至老虎滩界，去县六十里。编户四图，统村三十有六：新围，英德人筑而居之。

合兰上都 在县南二十里。编户十图，统村四十有四：钟冈，有英宁人插居。

这些记载，不可能齐全。因客家人多居住在边远山区，官方难以调查。据新县志附录的开居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在康熙二十五年前迁入增城的居民还有：赖姓居民于康熙元年（1662）从英德迁至小楼黄贝岭。夏姓居民于康熙四年从新丰迁至派潭九子坑（柴厂）。温姓居民于同年从英德迁至派潭马村。黄姓居民于康熙五年从新丰黄屋角迁至派潭密石。温姓居民于康熙九年（1670）从英德（来自河南）迁至派潭石龙头与高滩热水。邱姓居民于康熙九年从五华和平章山村迁至小楼江坳赤岭。范姓居民于康熙十年从紫金迁至镇龙福洞。刁姓居民于康熙十年从龙川县迁至正果刁韩村。王姓居民于康熙初年从梅县松源迁至正果马鼻岭、布洞（旧称富洞）、珍珠山等地开居。赵姓居民于康熙十五年（1676）从新丰分别迁至派潭潮山和高滩山枣坛。吴姓居民于同年从江西经紫金迁至荔城镇隔水龙。练姓居民于康熙十七年从兴宁迁至荔城蚬壳陂。汤姓居民于康熙十九年（1680）从新丰迁至派潭车洞。潘姓居民于康熙二十一年从新丰迁至荔城沙厂村。张姓居民于康熙二十四年从曲江迁至派潭佳桐岭。可见清康熙初年进入增城的客家人已相

当多了。

编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增城县志》卷三有《品族·客民》一节，记载了客家人于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而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山税之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多。”“各都客民占居之地，旧志载有百花林、径下等十余村。自后错处峪峒间，或十余户，或数十户，建约筑围，不下百余所。”该志《区宇·里廛》记载了客家人所居的村落：

庆福都 旧统村二十有六：百花林，客户；径下，客户；柯岭，客户；峪尾，客户。今增村一：茶山，客户。

金牛都 旧统村三十有六：马料，今多客户；新围，客户；迎梅，客户。今增村四：……大寺坑，客户。

崇贤都 旧统村十有九……今增村十五：……山口，客户；九兴，客户；周田头，客户；大坑，客户；西坑，客户；丫髻山，客户；新宁，客户。

杨梅都 旧统村三十有四：礞下，客户。今增村八：……铜壶岭，客户；百丈，客户；车峒，客户；玉枕拖罗，客户；蕉坑，客户；梅峪，客户。

绥宁都 旧统村二十有二……今增村九：……罗峒，客户；兜谷岭，客户；朱盆园，客户。

清湖都 旧统村三十有九……熊黑岭，客户。今增村六：……庄子，客户；列石径，客户；白楼，客户。

合兰上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钟冈，客户。……今增村七：……清塘，客户。

云母都 旧统村二十有九：……乌岷沙厂，客户杂居；……今增村七……长兴围，客户；细山，客户；罗塘，客户。

绥福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罗布岷，客户；白木，客户杂居；古朗，客户杂居；郁岷，客户；朱冈，客户。今增村十四：……翟田，客户；九龙围，客户；麦村，客户；发昌，客户；隔山，客户；梅园，客户；永安，客户；苍子，客户；大涵，客户。

根据新县志所提供的资料，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十八年（1686—1753）间，迁入增城的客家人除上述所列之外，最少还有：黄姓居民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从紫金迁至朱村京山。赖姓居民于康熙三十年分别从平远大柘乡迁至派潭灵山亚口山和芹菜湖。陈姓居民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从蕉岭县石礫乡迁至福和坳头村。林姓居民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从福建经惠州迁至永和厅厦围。郑姓居民于康熙四十年从博罗柏塘（来自兴宁）迁至荔城镇田心围。另一郑姓居民于康熙四十一年从嘉应州迁至小楼竹坑上塘。马姓居民于康熙四十四年从兴宁迁至荔城镇西瓜岭。邹姓居民于同年从福建迁至中新径贝。钟姓居民于康熙四十五年从梅县迁至镇龙旺村。邹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从博罗（来自长宁）迁至派潭刘家邹屋。谢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三年从紫金迁至中新光墩村（今属集丰）。另一钟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三年从兴宁迁至福和塘尾村。彭姓居民于康熙五十四年从紫金县迁至荔城镇彭屋。巫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五年从梅县迁至镇龙九龙围。石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五年从兴宁迁至派潭何大塘。陈姓居民于同年从新丰（来自南昌）迁至荔城镇大步口。罗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七年从紫金迁至宁西百湖。何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从惠州迁至荔城亭子岗。另一王姓居民于康熙六十年从梅县松源（来自福建）迁至